件；一些学生曾经历过针对华人的骚扰、偷窃或抢劫行为。  
　　难民潮加剧治安恶化  
　　2016年12月，意大利罗马，中国留学生张瑶被抢劫后在追逐劫犯过程中失联，案发近3天后尸体在铁轨旁被警方发现。监控录像显示，张瑶在追赶中跨越了铁道隔离带，被高速驶过的列车撞击致死。3名涉案嫌犯均为留意难民，其中1人未成年。两名成年嫌犯拉莫维奇和塞费罗维奇盗窃罪成立，分别判处2年和1年半监禁，但因刑期不足而不必入狱服刑。其中，拉莫维奇因有前科被判在家中执行，而塞费罗维奇则于宣判后重获自由。2017年5月10日夜，塞费罗维奇向一台露营车投掷了自制燃烧弹，烧死了车主熟睡在车中的3个女儿。据媒体消息称，车主哈利洛维奇曾在警方调查张瑶案过程中指认塞费罗维奇，此举可能为后者的报复行为。塞费罗维奇两起案件连害4命震动了整个意大利。  
　　近年来大批东欧、北非等地非法移民不断涌入，意大利治安状况直线下降。这些人大多不具备合法居留身份，无法获得劳动资格，很多人是无业游民和流浪者。他们散布在意大利各地，不少人走上了犯罪道路。  
　　在意大利的旅游景点和火车站等地，游人被盗抢案件屡见不鲜。由于警方效率低下、法律惩罚过轻等原因，此类案件大多无法侦破，即便破案抓人，罪犯也常得不到应有制裁。  
　　大量抵意难民中还混杂着极端分子。涉嫌在柏林制造卡车恐怖袭击的嫌犯阿尼斯·阿姆里，就是经海路抵达意大利的偷渡难民之一。民间对于“打开大门迎接难民”的决策越来越不满，而几十万偷渡难民滞留在意大利无法得到安置的事实仍让人们随时面临人身安全等威胁。  
　　德国联邦家庭、老人、妇女和青年事务部2018年1月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德国暴力犯罪案件随着境内难民数量增加而增多，难民群体的犯罪率远高于其他群体。以德国下萨克森州为例，该州暴力犯罪案件过去两年上涨了10.4%，其中92.1%的新增案件由难民造成，且绝大多数为年轻男性难民。犯罪学家克里斯蒂安·普法伊费尔认为，缺乏女性亲属陪伴成为这类男性难民犯罪的主要诱因。  
　　2016年底，先后有两名中国女留学生在德国遭难民强暴，不少中国留德学生开始随身携带防狼喷雾、报警器等防身工具。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在网站刊发安全提示，提醒留学生尽量避免夜晚独自外出或前往偏僻地方，尤其强调留意身边可疑人员，防止被跟踪，遇到搭讪纠缠应尽快脱身。  
　　心理健康不容忽视  
　　留学生的心理安全也受到关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教育处向在英80多所高校就读、进修的中国学生学者发放的调查问卷发现，41.1%的学生表示与英国人交朋友存在困难，32.9%的学生称难以融入社交活动和聚会。文化差异、独自生活、难以融入社交圈，使部分留学生感到孤独和心理压力。  
　　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总领事缪长霞说，留学生年龄普遍偏小、远离父母、独自居留国外学习，学业压力、经济压力、情感压力以及学生低龄化都有可能导致出现心理问题。种族歧视、性骚扰和语言挑衅等在澳高校也时有发生，这些都对留澳中国学生的安全构成潜在威胁。  
　　“随着在德中国学生的增多，近年来涉及中国学生的案件也在增多。普遍来说，刑事案件是个案。最影响留德学生安全状况的，主要是心理问题引发的各类案件。” 中国驻德国大使馆领事部主任周安平表示，造成留德学生心理负担的原因繁多复杂。首先，出国学生呈年轻化，独生子女的生长环境容易造成抗压抗挫能力差；其次，德国为非英语国家，语言沟通困难，心理困扰很难向周围排解；此外还有德国的气候原因，每年有近半年多为阴雨天气，日照时间短。  
　　学业压力是造成留学生心理问题的最大诱因。德国高校教育素以各类工科专业见长，选择留学德国的中国学生也多为工科背景。这类工科专业学时长，考核严格，毕业率不高。语言、生活的不适应，加上一些父母“望子成龙”的期盼甚至是投资心态，给留学生带来了不小压力。原本在国内很优秀的部分中国留学生，无法面对到德国后成绩下滑的心理落差，一旦看到毕业无望，心理防线很容易崩溃。  
　　（本报记者章念生、龚鸣、韩秉宸、冯雪珺、李应齐、李锋采写）  
　　  
　　链接  
　　澳总体治安形势良好，但不能掉以轻心。留学生必须提高安全意识，保持和国内亲人的联系畅通。如需外出，一定要提前向家人或朋友告知行程路线，因为澳大利亚地广人稀，很多地方手机信号覆盖不到。家长应鼓励孩子出国后在中国大使馆网站注册，留下联系方式，以备不时之需。  
　　——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教育处公使衔参赞徐孝  
　　近年来，车祸、溺亡、酗酒、打斗等事件不时发生，暴露了部分留学生安全意识不足、遇事不冷静、不遵守交通规则等问题。在留学生较多的城市如多伦多和温哥华，交通事故每年都有。  
　　——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教育处公使衔参赞杨新育  
　　每年新生入学季使馆均邀请专家进行各类安全讲座，针对学生在异国孤寂、心理不适等状况成立“留俄加油站”，聘请心理专家提供心理咨询。  
　　——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教育处公使衔参赞于继海  
　　近年旅日留学生被人骗走钱财、介绍非法打工等案件多发。留学生在日常交往中应谨慎对待朋友提出的大额借款、货币兑换、代人收货、介绍打工、借用身份证件、带物回国等请求，切勿盲目听信他人一面之词。一旦落入骗局，不仅要蒙受财产损失，还有可能因违反日本法律被遣返，甚至面临刑事处罚。部分留学生因语言不通、学习任务重、生活不习惯、感情受挫等原因导致心理压力过大，要同国内亲友或留学生同学多沟通。家长应全面掌握孩子在日本的具体信息，以便发生意外状况时能及时准确向警方和使馆提供信息。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官网    
　　（本报记者李锋、吴云、张晓东、田泓采访整理）  
　　制图：张芳曼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家庭有实力承担子女出国留学的费用，加之当前国内教育资源分布不均、国外留学政策不断放宽，中国在海外的留学生人数连年增长。同时，留学低龄化趋势日渐凸显，留学安全问题也日益严峻，而留学生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度依然不够。  
　　留学安全包括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心理安全等方面，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包括留学生自身安全意识不强，缺乏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缺少与朋友或家人足够的沟通，缺少获得安全培训的渠道，以及恐怖袭击、政局动荡等潜在的安全风险等。  
　　人身安全主要有交通安全和侵害问题。侵害问题既有人际交往过程中熟人的侵害，也有陌生人为达到某种目的的侵害。女性更易成为被侵害目标。心理安全问题的产生既与语言、文化和生活环境的差异相关，也与留学生不善于自我调节、受挫能力差相关。留学生初到国外，面临着适应新环境和学习上的双重压力，如果长时间无法适应且缺少与人交流沟通，容易产生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  
　　留学生、家长、留学中介机构及社会各方面都需要采取有效措施以提升海外留学生的安全状况。  
　　对留学生而言，提升自我保护意识最重要。留学生普遍认为欧美等发达国家治安条件好，对自身所处环境放松警惕。在选择学校、居住地点时，应通过向学校咨询、与中国留学生交流或查看校园安全统计数据、犯罪地图等方式选择安全的学校和居住社区，尽量避免去偏僻地方或夜间出行。日常生活中应保持低调、不露财，不要携带大量现金。建议留学生和国际学生办公室保持联系，将学校提供的安全服务电话、当地警局电话等急救电话加入应急通讯录，遇到问题及时求助。  
　　此外，留学生应通过各种渠道了解所在国家或地区不同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特别是基于文化和价值观不同而产生的禁忌，与人相处时学会尊重不同的行为方式。在生活中，应树立乐观的生活态度。特别是，留学生应提升法律意识，了解所在国的基本法律制度及司法处理程序，避免出现法律问题，同时也学会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从家长的角度，应注重培养子女的独立生活能力、关注孩子的心理需求。家长在计划子女出国留学的过程中，除了物质保障，一定要注重培养其独立生活能力。孩子出国后，父母应多与孩子沟通交流，及时开导和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案。  
　　由于学生和家长对国外的了解有限，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通过留学中介机构了解海外学校和提交申请，这些机构也成为学生了解国外情况的重要渠道，因此在培养学生的安全意识方面，留学中介结构也可以发挥一定作用。  
　　此外，中国驻外使领馆提醒留学生到达目的国后，一定要到当地的中国使领馆备案，填写个人及国内外联系人的详细信息，以便在当地万一发生战争、恐怖袭击或其他突发事件的情况下，及时得到驻外使领馆的保护。  
　　（作者为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  
　　常驻德国时，有位留学生告诉我，她三年丢了两部手机。一部是逛街时被盗，一部是坐地铁时被抢。她到警察局报警，对方很干脆地让她回家，理由是警方人手不足。类似案件当然不止在德国发生。但近年来德国涌入上百万难民，导致警力捉襟见肘、社会治安恶化、民众不安全感上升，也是事实。  
　　中国每年有50多万学生留学海外，而留学生年龄越来越小，在各种社会不安全因素前更显脆弱。外交部领事司数据显示，中国驻外使领馆和领保中心受理的领事保护和协助案件数量呈加速发展态势。其中涉及留学生的案件从2014年的932人猛增至2015年的6185人。  
　　值得注意的是，调查显示66%的留学生对个人安全意识缺乏足够认识。“平不肆险，安不忘危。”留学前上的第一课应当是了解相关国家的安全形势，提升个人安全意识。  
　　不少留学目的地国安全形势恶化的背后，往往有着经济长期不振、贫富差距加大、法律机制漏洞、种族歧视蔓延等更深层原因。不禁想起去年拉斯维加斯枪击案后，一位在现场的法国在华留学生康坦·阿尔贝发布的视频。他在视频里感叹：“我在中国7年了，从来没有感到过不安全。一个人只有在不安全的时候，才会感到安全有多舒服。”  
　　新时代赋予文学以使命，也带来新挑战。我们正走在前人所没有走过的道路上。在这个充满无限可能的世界，“新时代文学”既要充分汲取历史经验，又要勇于面对新问题、新现实、新经验，以开阔胸怀讲述新的中国故事，凝聚中国人思想、情感与心灵世界，将中国经验熔铸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经典，唯有如此，方能不负使命  
　　  
　　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个对我国发展新历史方位的战略判断，将对我国社会和各方面事业产生重大影响，对文学也是如此。  
　　现在不少学者谈论“新时代文学”，大多是在宽泛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和曾被广泛使用的“新世纪文学”一样，只是在自然时间意义而不是在“质的规定性”意义上谈论“新时代”。“新时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发展到新阶段产生的文学，其内涵、外延、功能、使命，都在发生新变化，需要我们调整思维习惯、知识结构与判断标准，从“新时代”视角重新思考文学，思考文学与现实、与世界的关系，以促进文学发展。  
　　“新时代文学”尚需在实践中逐渐完善，这就需要我们有所前瞻、有所期待，通过对“新时代文学”与新时期文学、新中国前30年文学、五四新文学乃至中国传统文学比较，把握其性质与未来发展走向。  
　　“新时代文学”之新在于以人民为中心  
　　相对于新时期文学，“新时代文学”之新在于以人民为中心。新时期文学是在对“文革文学”批判反思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时期之初走在时代前沿，率先反思“文革”及其文学，参与并促进思想解放运动，在语言、形式等方面探索中，拓展现代汉语表达能力。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文学逐渐形成一种精英化、西方化与现代主义式审美标准；90年代以来，伴随大众文化崛起，逐步形成一套以市场为中心的出版发行机制。  
　　以现在视野来看，精英化、西方化与现代主义审美标准，主要面向知识分子、评论家或海外奖项的写作，所谓“走向世界”只是走向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以外在标准评价规范中国文学。而市场化在促进通俗文学、类型文学发展同时，整体上突出文学的娱乐消遣功能，削弱文学所具有的认识、启迪功能，严肃文学在文学市场乃至整个社会领域逐渐边缘化，弱化对世界观塑造和引领作用。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具有鲜明现实针对性。“新时代文学”在发展过程中，应该将“新时期文学”相对化、历史化，并在重新审视基础上发展新的文学以及新的评价体系，使“新时代文学”在坚实轨道上良好运行。  
　　“新时代文学”之新在于更加重视文学规律  
　　相对于新中国前30年文学，“新时代文学”之新在于更加尊重文学自身发展规律，在于对作家艺术家“创作是自己的中心任务，作品是自己的立身之本”的强调。新中国前30年文学，提倡以工农兵等最广大人民群众为服务对象，形成独特美学风格，涌现出柳青、赵树理等人民作家，发展出较为完善的评价体系与较为完整的生产—传播—接受体系。但也有一定时代局限性，特别是以运动方式管理文艺，有时严重违背文学规律。新时期之后，社会各界对此有深刻反思，对其弊端有深入认识，但对“人民文学”的价值取向、美学风格与评价体系等正面价值认识不够。  
　　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方面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另一方面又指出，“文艺工作者应该牢记，创作是自己的中心任务，作品是自己的立身之本，要静下心来、精益求精搞创作，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这意味着，既坚持“人民文学”价值取向，又将“人民”从群体概念落实到“一个一个具体的人”，充分尊重艺术规律，尊重作家艺术家，才能迎来文艺真正繁荣。在这个意义上，“新时代文学”要借鉴新中国前30年文学价值取向、美学风格与评价体系，结合新时代条件进行新的探索与创造。  
　　“新时代文学”之新在于更有文化自信  
　　相对于五四新文学，“新时代文学”之新在于更有文化自信。五四新文学是在对中国传统文学批判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以“启蒙”和“救亡”相号召，通过提倡新思想、新道德，开拓现代中国人思想空间，塑造现代中国人灵魂，在20世纪中国历史上发挥独特而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五四新文学本身也有文化不自信一面，其文学观念是参照西方文学形式与标准形成的，在发展过程中受到西方文学、俄苏文学极大影响。胡适“全盘西化”等主张都可以说是文化不自信表现，当然他们的文化不自信有深刻时代背景：在列强环伺、山河破碎的旧中国，中国最优秀作家深刻感受到时代痛苦，他们“掮起黑暗的闸门”，创造中国“新文学”，使之成为现代中国文化核心，在思想启蒙与民族解放中始终处于先锋位置，为促进中国社会进步做出重要贡献。  
　　今天，我们已处于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几代中国人迫在眉睫的“救亡”问题，已经不是社会主要问题。虽然西强我弱整体文化态势没有改变，但伴随中国在世界格局中位置提升，中国人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越来越强，回首新文学之初可以发现，当时提出的不少思想命题是文化自卑或文化不自信的产物，需要我们重新梳理、思考和调整，在新的现实基础上提出新思想命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时代文学”既要继承五四新文学思想启蒙与忧国忧民优良传统，又要具备充分文化自信，在新时代创造新经典。  
　　“新时代文学”之新在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相对于中国传统文学，“新时代文学”之新还在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国传统文学有一套完整审美评价体系，形成自足系统，成为当代中国人文化背景与底色。经过现代化巨大转折后，中国传统文学离当代中国人生活现实已很遥远，但对当代中国人思维方式、情感结构以及审美趣味、习惯、偏好仍有极大影响，作为巨大思想艺术资源，中国传统文学可以为当代作家所借鉴。伴随着中国人文化自信增强，可以预期在“新时代文学”发展中，当代作家必将越来越多研究开发中国传统文学资源，在这里仍有一些问题需要注意：  
　　一是要避免简单模仿，从模仿西方经典到模仿中国经典只有一步之遥，但模仿只能是模仿，并不能产生真正杰作。  
　　二是要经过创造性转化，并非传统文学一切都是好的、都是值得借鉴的，我们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做出自己分析、判断、取舍，只有经过消化吸收之后，传统才能真正活在当下。  
　　三是要结合当代中国实际，生活是创作唯一源泉，只有深入当代生活，以此为基础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才能创作出具有生机与活力的作品，才能在新时代真正延续中国文脉。  
　　我们梳理“新时代文学”相对于“新时期文学”“新中国前30年文学”“五四新文学”以及中国传统文学的独特之处，并非对后四者的否定，而是在充分肯定其历史功绩同时，以今天的视野做出分析与判断。中国文学伟大之处在于总能与世推移，不断创造新形式与新形态，以书写中华民族生活史与心灵史，新中国前30年文学、新时期文学已完成其历史使命，而“新时代文学”则刚刚开始，它是在一个新的语境中展开的中国文学，等待我们放手去创造。  
　　新时代赋予文学以新使命，也带来新问题，需要文学去面对与解决。我们正走在前人所没有走过的道路上，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媒体数字化移动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中国历史乃至人类历史上的新事物，我们正在创造新的历史。在这个充满无限可能性的世界，“新时代文学”既要充分汲取历史经验，又要勇于面对新问题、新现实、新经验，以开阔胸怀讲述新的中国故事，凝聚中国人思想、情感与心灵世界，将中国经验熔铸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经典，唯有如此，方能不负使命。  
　　东方艺术一点一滴、喜怒悲欢，都有一个“美”字。传统根系远比我们今天看到的枝叶还要繁茂发达，我们手上拿着的是一只金碗，不能拿着金碗还讨饭  
　　  
　　戏曲演员，别贪图剧作家给你写了好剧本或者灯光打得漂亮，你把责任都给了人家，自己在干吗呢？一个好演员，能够填补剧本空白。好演员所以演得好，一定是对表演技能熟而又熟，精而又精——小数点后面很多位，都计量得很清楚，不能过不能欠，不能多不能少。即便是即兴，也都经过设计，不是随意流淌出来的，自然当中又特别规范。这一点如果想从理论上完全解剖得特别清楚，是很难的；如果完全说透，也就没那么奥妙了。  
　　我14岁那年，李少春先生给我讲他和余叔岩学《战太平》。出场、回去，又出场、又回去，往返七八番。他问余先生：“对了吗？”余先生答：“你觉得你对了吗？”“我觉得还是有点别扭。”“那就是没对呢！”一个上场就这么反反复复地练。他在告诉后辈一个道理：宝贝不是那么轻而易举就跑你兜里了，必须持之以恒地付出。  
　　现在排新戏风气比较盛。排新戏是好事，可是如果唱念做打没有提升，等于白排，瞎耽误工夫。演员最怕回功，排一部戏回去一点儿，腿也抬不起来了，身也翻不了了，得不偿失。“男怕西皮，女怕二黄”，西皮指什么？它指的是正宫调门上的西皮，跟平时说话似的西皮，没人怕。老谭家（谭鑫培）那时候没有麦克风，全凭嗓子，这一嗓子，二里地出去了。现在调门越唱越低，嗓子就没了。  
　　演员的输和赢，是“每戏一得”还是“每戏一失”，要自己去算。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是每出戏都有一点进步。排《哪吒》，我学会耍彩带、大藤圈、锤、九节鞭。九节鞭我是跟河北一位体育冠军李春来学的。排《钟馗》之前，我不会写毛笔字。那段时间，只要见了书法家就让人家写“一树梅花一树诗”，这是戏里要用到的，我就看人家怎么写、怎么布局。为写好这二十几个字，我随身带着一张板子，下了戏就在屋里练。  
　　排《赵佗》，我学打鼓。小时候，我学《击鼓骂曹》，唱念都没有问题，但因为我“阴阳锤儿”，手不好使，这个戏始终就没唱。我不服气，没完没了地练，包里经常带着鼓楗子，时间长了，把包顶了个窟窿。我是个笨人，他们说我聪明，聪明和笨，差不了一根头发丝儿，我就是锲而不舍，老琢磨它。到了要排《赵佗》，我下决心，拜“小字辈”为师，跟河北省京剧院鼓师马建立学。一天学一个鼓点儿，一个星期我努力学才能记住三个点儿，一段“夜深沉”学了两个多月，一直练到2013年，房间椅子上的小坑就是那段时间练出来的。现在这把年纪，我还是求个上进，好的能够保持一点，不好的能够好一点，不会的能够会一点。  
　　回到新编戏，即便做也不能只讲究故事多么完整，重点还是展示演员身上那点玩意儿，这一点不能变。我排新编戏《赵佗》，靠把武生戏向传统靠拢，虽故事简单，却可以展现演员传统戏的功力，这是我要的。  
　　我深深感到戏曲传统真是太好了，老本子、老程式、老曲牌，特别好用。很多时候，你觉得自己差不多了，一旦开始创作，就觉得什么都没有似的。没辙的时候也别急，从传统里去“淘”，一翻里边就有好宝贝，肯定能救你一把，但凡淘到一点儿，就能让你光芒四射。凡是看到我冒火花那点儿，准有根基，绝对是老祖宗留给我的东西；即便有所发挥、有所发展，也不是凭空而来。  
　　有人说我是“保守派”，要我说，我守得还不够。昆曲原来有3000多个曲牌，连“备轿”都有专门曲牌，比电影、电视剧精炼多了，非常艺术化。我们后人没出息，丢了很多。传统里有很多登峰造极的东西，它的一点一滴、喜怒悲欢都有一个“美”字。传统的根系远比我们今天看到的枝叶还要繁茂发达。我们手上拿着的是一只金碗，不能拿着金碗还讨饭。  
　　我5岁登台，是吃戏饭长大的，我尊重我的饭碗。我太热爱这门艺术，知道它好在什么地方，知道多少老前辈、名家为它下了多少功夫，所以我不敢妄为。我们不能拿它开玩笑，要好好爱护它、尊重它，要好好看看自己母亲长什么样，不能因为还没有好好认识就排斥她、嫌弃她。对观众尤其年轻观众也是这样，他们就跟孩子一样，第一口奶要货真价实，不能掺水作假，否则孩子口味和脾胃就败坏了。  
　　追求自己的风格特点，每一个演员都向往。但达到这一目标必须是水到渠成，必须先有根须后有枝叶，没有捷径可以走，别人的肉不会长到你身上。尊重传统、热爱传统、吃透传统，这之后长出的东西才是最强壮的，才是真正有价值的新东西。  
　　裴艳玲，戏曲表演艺术家，生于1947年，籍贯河北省肃宁县。文武昆乱不挡，唱念做打俱佳，有“活钟馗”“活武松”“活林冲”之称。曾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现任河北省文联主席、河北省京剧院院长等职。代表剧目《钟馗》《夜奔》《宝莲灯》《响九霄》《甲子四折》《赵佗》等。  
　　其实大多数“恶搞”并不好笑，自以为有趣其实令人尴尬，自以为时尚却早已烂俗，除了令演者出丑、观者“尬笑”外，惟余一地鸡毛  
　　  
　　近日，音乐家冼星海、光未然后人针对网上流传某单位年会恶搞《黄河大合唱》视频提出批评，有网友细心搜集，又发现数段类似“恶搞”视频片段。文化部要求互联网文化单位排查有关视频，自觉抵制恶搞红色经典及英雄人物的互联网文化产品。  
　　浏览后发现，这些视频多来自公司年会、学校班会等场合的群众自排节目。内容上高度雷同，大都通过夸张、戏谑方式进行改编表演，比如用床单来表现黄河，以“嚎叫”取代“咆哮”，以“呼吁年终奖”替换“保卫家乡！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主题，以“精神病合唱团”来戏谑音乐所表达的严峻形势和奋起抗战态度。然而，就是这些并不高明甚至每每令人尴尬的表演视频，却在网络上博取不少点击。  
　　“恶”与“搞”二字都不喜人，放在一起格外容易望文生义，每每让人感受其“恶意”和“居心叵测”。看过这类“年会恶搞视频”后，就会发现用“居心叵测”来形容它们实在有些“高看”——它们主要目的是“搞笑”，经典作品妇孺皆知，有现成故事人物，门槛低、上手快，自然成了“最佳目标”——搭架子不会，拆架子还不会？编新段子难，毁老故事还不容易？加之，解构严肃常常能轻松收获笑声。于是乎，为尽快上手，为片刻调笑，为表明自己并非无趣甚至非常有趣，为表演者获得一时存在感，这种自娱自乐式的恶搞便流行起来。什么价值观、正能量，在这个场合哪有笑声来得实在？生活中怎能处处严肃，聚会上还不允许轻松一下吗？这种“恶搞有理”“有趣至上”的观点流传甚广，但其实大多数“恶搞”并不好笑，自以为有趣其实令人尴尬，自以为时尚却早已烂俗，除了令演者出丑、观者“尬笑”外，惟余一地鸡毛。  
　　有人会问：为什么周星驰恶搞古代故事成了经典，我们恶搞就成了“三俗”？  
　　周星驰确实有“恶搞”的一面，被视为当代“恶搞”鼻祖，但是，既要看到他频繁使用戏仿手法、“无厘头”风格，还要领会其喜剧之所以受到青年观众普遍认可的精髓：戏仿在周星驰手里从来就不是目的，而是他抉剔丑恶、发扬真善的一把利器。其刀锋总是对准人性中的虚伪、愚蠢和外强中干；其中小人物之所以“咸鱼翻身”，也是因为受到善念、正义激发而获得心性成长。在以戏仿等方式剥落虚张声势、装腔作势者的画皮后，观众和片中人物一同受到心灵洗礼，真善美水落石出、春风化雨，观众则敞开心扉、心悦诚服。《武状元苏乞儿》《功夫》《美人鱼》都以放弃世俗成功、回归真实简朴生活为故事结局，显示了一种“反身而诚，乐莫大焉”的圣贤境界。可以说，在上世纪90年代“